



唐朝的 驿站

夏坚勇

著



唐
朝
的
驿
站

夏堅勇

著



長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唐朝的驿站 / 夏坚勇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702-0006-1

I. ①唐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88015 号

责任编辑：周 聪

责任校对：陈 琪

封面设计：颜森设计

责任印制：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：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：430070

发行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：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：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

1/32 印张：7 插页：4 页

版次：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119 千字

定价：38.00 元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27—87679308 87679310）

（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）

目 录

第一辑 唐朝的驿站	1
唐朝的驿站	3
文章西汉两司马	9
九品县尉	14
白居易做过的几道模拟题	18
贺知章的悲剧	21
冷 官	24
挂 剑	28
题匾说趣	35
心 香	39
萧瑟南朝	42
大哉吴门	46
十七年的分量	51
一条大河的故事	54
第二辑 温暖而感伤的记忆	59
温暖而感伤的记忆	61
土 仪	68
沧海月	73

大暑天为什么呼喊“小寒”	77
书笺小祭	80
虹桥回首	85
老 街	90
飞 天	95
石板街的回声	98
三种草	102
童声合唱	113
村景三题	117
怀念小屋	125
靖江思语	128
采桑子	133
那个周末的晚上	137
1976 年的爱情	140
香 水	143
高尔基不喜欢的房子	149
第三辑 英雄赋	153
英雄赋	155
战争赋	184
手艺活儿（代后记）	217

| 第一辑 唐朝的驿站

唐朝的驿站

石碑的右侧是潼江，小晌午了，晨雾仍未散去，朦朦胧胧的一脉春江，水势很低调，隐约显现着几块鸭头似的沙渚，却看不到一只先知先觉的鸭，所以也不知水暖了没有。石碑的左侧是历史上著名的金牛蜀道——现在当然修成了国道，编号很豪迈：108，似乎这道上走的都是绿林好汉。国道边的山坡上长满了柏树。柏树威严而沉静，让人想到不苟言笑的武士。没错，这里的柏树相传原先は三国时镇守巴西（阆中）的大将张飞所栽，不要以为这只是“相传”而已，仔细一想，张将军栽的就应该是柏树，他不会栽下春风杨柳万千条，更不会栽灼灼其华的桃树——虽然他们三个好基友结义是在桃园。

石碑上有阴刻的铭文：“唐明皇幸蜀闻铃处。”

唐明皇就是唐玄宗李隆基，清代因避康熙皇帝玄烨的“玄”字，改称明皇。根据这个称呼，不用看上款，我们大致可以断定这是清代的石碑。天宝十五载（756）七月十七日，唐明皇一行来到这里的上亭驿，他是从长安往成都去的，所以叫“幸蜀”。皇帝出行离不开翠华摇摇的排场，但这一次是个例外，不是君王不“好色”，而是时势使然，他是逃难来的，所谓“幸蜀”其实很不

“幸”，也就顾不上翠华摇摇了。如果说一定要说“摇”，只能说风雨飘摇。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耀武扬威地开进了长安，老皇帝和太子一个往西蜀跑，一个往朔方跑，唐王朝还不够“飘摇”吗？而且现在他也不是皇帝了，儿子给他在皇帝前面加了“太上”两个字，这两个字的意思本来都很高端，但加了以后，他的地位反倒下来了。看来凡是用豪华的大词恭维人的，大多心怀鬼胎。太上皇帝，称号很牛很神圣，但说话的影响力只在户牖之内。诏书更不值钱，洛阳纸贱。那就不说话也不下诏书，枕着窗外的潺潺雨声，做梦。

上亭驿在梓潼城北的七曲山下，所谓的金牛蜀道，即从绵阳、梓潼经剑阁、广元越白水，进入陕西汉中，其中最为崔嵬奇险的则是从梓潼到广元这一段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是出川，那么到了梓潼，“蜀道难”的考验才算真正开始；如果你是入川，那么到了梓潼已经坡去平来，再往前朝成都去，路就好走了。唐明皇一行是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的，这一个多月的经历有如漫漫长夜的梦魇一般，始终在噩耗和惊魂之间颠沛流离。特别是在长安附近的马嵬坡，他心爱的贵妃杨玉环被哗变的士兵用一根白绫缢死在驿站。对于这个叫李隆基的男人来说，杨玉环不仅是一个可以侍寝的美丽的妃子——他身边并不缺乏具有性魅力的嫔妃，何况杨玉环已远不年轻——她早已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上亭驿的夜晚凄清而孤寂，夏天的雨往往金刚怒目，夜雨却例外。夜雨是慢性子，有如一个老者在翻着发黄的史书，有一搭没一搭的，翻到哪页是哪页。但不管窗外的雨翻到哪一页，太上皇的眼前总离不开贵妃的音容……

诗人后来描写那个夜晚，只用了一句：“夜雨闻铃肠断声。”其

中既有写实也有艺术的渲染，说太上皇思念贵妃，恍惚中似听到贵妃熟悉的呼唤：“三郎、三郎……”一声声亲昵如酥。醒来后却四顾茫然，窗外风雨如昨，只有檐角上的风铃“叮当、叮当……”

《长恨歌》为白居易带来了巨大的声誉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中国历史上抒写爱情的长诗一共只有两部半：《孔雀东南飞》和《长恨歌》，这是两部；另外还有曹子建的《洛神赋》，写暗恋、单相思，只能算半部。这中间，《长恨歌》无疑是成就最高的。正是这部作品决定了白居易在唐代诗坛上的地位，如果没有《长恨歌》，他大抵只能和刘禹锡、元稹等人比肩。现在，他可以跨上一步，勉强和李白、杜甫站在一起了。《长恨歌》是一部致敬爱情的伟大史诗，不能说帝王和妃子之间只有性而没有爱情，他们之间产生爱情的几率和普通人一样高，甚至还要更高一些。因为爱情是需要经营的，他们比普通人有更多的闲情逸致用于经营；而柴米油盐的庸常生计则让普通人的爱情经营成为一种奢侈。对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，白居易是由衷赞美的。但长期以来，主流评价却认为作者的思想倾向在于讽刺，最多也不过是同情而已。我不知道这些“主流”们在阅读《长恨歌》时有没有被感动过，如果被感动过，那他们的评价就是为了附和某种教条而言不由衷。如果没有被感动过，那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是冷血动物，而冷血动物有什么资格来评价人类高贵的爱情呢？白居易自己是情场老手，也是在诗歌中描写女性的高手，他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，有好多是关注女性命运的，除《长恨歌》而外，例如《琵琶行》《上阳白发人》《井底引银瓶》《缭绫》，等等。无论关注的对象是宫廷贵妇、风尘娼妓，还是蓬门织女，他的

目光中始终流泻着理解、尊重和欣赏，当然也有几分温情脉脉的缠绵意味。大师们都有各自的独门绝技，在对女性的体验和表达方面，白居易超过了李白，甚至也超过了杜甫。也许他写得太好了，以致引来了非议，例如清代的龚自珍。龚自珍这个人才气大，也狂，臧否人物常常惊世骇俗。他说白居易“真千古恶诗之祖”，理由是：“长恨歌‘回眸一笑百媚生’乃形容勾栏妓女之词，岂贵妃风度耶！”这话猛一听似乎有理，其实毫无道理。我想，所谓的“贵妃风度”大抵就是古典版加青春版的“马列主义老太太”吧，那样一副尊容，有多少男人会真心喜欢呢？

杨玉环这个女人不简单，站在唐代诗坛最高端的几位大腕——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——都为她写过赞美诗，其中李白的三首《清平调》是面对面的赞美。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，这两个“想”何等好啊！好得只可意会，不可翻译。不信你译译看：“贵妃的面孔像花儿一样美丽。”立马成了小学生作文。有人说李白的诗中暗寓讥讽。扯淡！那是高力士说的，也只有高力士那种心态的人才会相信。在有些人眼里，不光是《清平调》，就连《蜀道难》也成了“讽刺玄宗逃难入蜀之作”。似乎离开了影射，世界上就没有诗了。《蜀道难》和玄宗入蜀有什么关系呢？李白的老家就在梓潼附近的江油，年轻时，他师从赵蕤，送老师回盐亭，梓潼是必经之地。送过了老师，他兴致来了就往上走，去剑阁、广元，体验蜀道的奇丽惊险，虽步履艰难却意气风发。当斯时也，山川、历史、神话、传说，全都成了诗神的奴仆，“噫吁哉，危乎高哉！”这样气势逼人的诗句就只等着喷薄而出了。但李白出川时并没有走蜀道。蜀道太难

走了，他走的是三峡水路。这大概是性格使然。出三峡，一叶轻舟，顺流直下，何等倜傥轻捷。他是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的人，如果走蜀道，一步一蹉跎，他还笑得出来吗？

就在唐明皇夜宿上亭驿大约三年以后，诗人杜甫从秦州辗转入蜀。他一路走一路写诗，一直写到剑阁。写诗易，蜀道难，一家人走走停停，整整走了一年才到了成都。他当然也要夜宿上亭驿的。驿站檐角的铃声依旧，触景生情，他会想些什么呢？在长安的大街上，他是见过杨家姊妹的，这有诗为证（《丽人行》）。他也曾因杨贵妃的死讯而吞声饮泣，这也有诗为证（《哀江头》）。无论是对贵妃的美，还是对李杨的爱情悲剧，他都是由衷赞美也由衷哀悼的。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，他的《哀江头》其实已为五十年后白居易创作《长恨歌》定下了基调。请看：“清渭东流剑阁深，去住彼此无消息。”马嵬之变后，杨玉环孤独地葬在渭水之滨，唐玄宗则往剑门关的深处渐去渐远，一对情侣，彼此再无消息。这样的句子如果混在《长恨歌》里，粗心的读者还真不一定看得出来。所以后世的学者认为，《哀江头》和《长恨歌》可以互读。

其实杨玉环也是从蜀道走出去的，她父亲曾在蜀中做官，她亦在蜀中长大，山温水软的四川盆地滋润了她的好颜色。一个绝代佳人沿着金牛蜀道走向了京师长安，走进了王朝的权力中心。从她的背影里，人们读懂了一个词：乱世之美。在所有的美中，这是最无法无天所向披靡的，是美中的极致。极致的美和极致的权力结合在一起，那就莫怪天下大乱了。

好吧，现在让我们看看石碑的落款。果然是清代的。上款：

“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仲夏月”；下款：“知梓潼县事昆明桂良才书”。

我对“光绪二十年”没有什么感觉，但一看“甲午”、而且是光绪年间的“甲午”，心头便不由得一阵黯然，随即又想到，梓潼的地方官为什么要在这个甲午年发思古之幽情呢？

这可能牵涉到对唐明皇夜雨闻铃的另一种解读，说当夜唐明皇在上亭驿遇见神仙托梦，告诉他唐军大捷，叛乱即将平定。第二天果然驿马来报，安禄山已死，请太上皇回銮。这是一个关于否极泰来挽狂澜于既倒的寓言，而在那个世纪末的甲午年间，危如累卵的大清帝国是多么需要这样的寓言。由此可以想见，那个叫桂良才的知县倒是一位忧时之士呢。

但我还是喜欢第一种传说，相对于成王败寇的政治游戏，只有爱情是不朽的。

文章西汉两司马

长安西北的茂陵原先只是一片荒原，自建元二年开工修建皇陵以后，这里就日新月异地繁荣起来。陵墓的主人是当今皇上刘彻，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千古一帝的汉武帝，他登基时才 17 岁，但从 18 岁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，一直修了 52 年才派上用场。后来的历史证明，他的这项记录几千年一直无人打破，可见“千古一帝”并非浪得虚名。和平年代，皇陵是天底下最浩大的工程，据说开支为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。把全国三分之一的钱都砸在这里，还能不砸出点声响来？皇上是个喜欢轰轰烈烈地闹腾大事的人，大概害怕自己死后太清冷，又下令官员、富豪，还有文艺界的明星大腕们迁居于此。由是新城人气飙升，灯红酒绿，很快就成了长安附近著名的富人区。

元狩五年，也就是汉武帝登基的第 23 年，茂陵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，一位名满天下的大作家死于糖尿病，临死前还留下了一篇《封禅书》，为皇上后来兴师动众地封禅泰山、访求长生不老之术提供了理论根据，这当然让皇上很高兴。而就在这期间，当时还默默无闻、但后来同样名满天下的另一位大作家正好风尘仆仆地采风归来，正准备开始他的写作生涯。历史似乎有意在茂陵安排了

这两位文章高手的交接。这两个人一个叫司马相如，一个叫司马迁。

司马相如名气很大，这固然由于他与卓文君惊世骇俗的爱情，更重要的却是由于他恣肆汪洋的才华。他的文章写得好，特别善写辞赋。赋是当时最风行的文体，一篇赋的影响力，往往可以让作者名声鹊起甚至上达天听，此前贾谊的“宣室夜对”和此后左思的“洛阳纸贵”都是由于赋写得好。而当今皇上又特别好这一口，在杀人和玩女人的间隙里，他喜欢摇头晃脑地吟诵辞赋作为激情过后的消遣和自娱，以寻求快感的延时效应。赋者，敷也，就是铺陈，满篇尽是华丽生僻的词藻，洋洋洒洒地铺陈开去，对偶、排比、连句层层渲染，让你目不暇接。这种文体多用于描写都城、宫宇、园苑和帝王穷奢极欲的生活，说到底是给权势者歌功颂德捧臭脚的东西。二千多年后有一位伟人在文艺座谈会上说：歌功颂德的作品“未必不伟大”。但睽诸文学史，为权势者歌功颂德，这类作品中“伟大”的比例实在太少，因为伟大的作品多是面向民众且具有悲悯情怀的。但权势者喜欢有人向他献媚，为他歌功颂德。献媚是献媚者的通行证，写那样的作品，作家往往名利双收。司马相如就凭几篇大赋当上了皇帝的文学侍从，并且住进了茂陵的富人区。毋庸置疑，该同志是个文学天才。但天才的第一声啼哭也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，比他年轻三十多岁的司马迁后来给他作传时，说他“口吃而善著书”。也就是说，他口才不行，但能写。这样的大作家倒也不少，例如现代文学史上的曹禺和沈从文。说起来很有意思，司马相如原来的名字叫司马犬子，这说明他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，不然

不会取“犬子”这样土得掉渣的名字。他最早的文学自觉是给自己改名为“相如”，这名字不错，不光文气，还有几分软软的奶油味——他本来就是个吃软饭的嘛，甚好！

但软饭也不是好吃的，你不仅要仰承鼻息，善于揣摩皇上的喜好，还要在艺术上有两刷子。赋那种东西尽管很主旋律很马屁，也尽管华而不实虚张声势，但要做到妙笔生花，在题材、立意和文笔上让人眼睛一亮也不容易，那是需要有几分才情的，至少也要有几分聪明气。司马相如当然不缺少才情和聪明气，要不然皇帝手下有那么多文学侍从，衮衮诸公，竞相献媚，为什么只有他独领风骚呢？还不是因为人家活儿干得好？你看他的《上林赋》《大人赋》和《子虚赋》，那真是翠华摇摇仪态万方啊！平心而论，司马相如还说不上厚颜无耻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他“与卓氏婚，饶于财，其进仕宦，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，称病闲居，不慕官爵”。因为他老丈人给了他一大笔财富，小日子过得很滋润。再加上糖尿病缠身，对升官发财就看得比较淡，有时甚至还敢说几句别人不敢说的话，例如劝皇上打猎要适可而止之类。在御用文人中，他还是有底线的。

司马迁也住在茂陵，他父亲是朝廷的太史令，这是个小官，俸禄很少，在茂陵那种地方，他们家只能算是穷人。对于一个天资聪颖且志存高远的少年来说，这种生存境遇只会是一种激励。父亲是史官，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史学熏陶。20岁后他又花了整整七年时间游历四方，一步一个脚印地阅读广袤的帝国版图，全方位地感知这片土地上的历史积淀和风俗人情。人们常说，机会总是青睐有

准备的人，现在，司马迁已经为写作一部旷代史书做好了准备。而且就在他游历归来不久，他又接替了父亲的职务。这个太史令闲曹冷灶，清汤寡水，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自由地进入皇家图书馆，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，想查什么档案就查什么档案。对于一个有志于史学的写作者和思想者来说，有了这个“唯一”就足够了。

一切都为一部史学巨著的诞生做好了铺垫。

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，这部被称为《史记》的巨著也许不会完全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，它当然会很丰厚，有文采，体例也别出心裁，古今中外，包罗万象，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总体品格远远高出历代的那些史书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但很可能不会有后来那种长风烈火般的激情和精神高度。

就差那么一点，或者一点点。

上苍似乎很在意这“一点点”，一定要用作者个人惨痛的悲剧来成全一部巨著的完美。

天汉五年，司马迁因李陵冤案被祸，在死刑与宫刑之间，他选择了后者。这是一种比死刑更加惨痛也更为耻辱的刑罚。司马迁不是怕死，而是由于心系《史记》，这部书是属于他的，但又远远大于他个人的生命、痛苦和屈辱。正是这种对史学的苦恋情怀，让他活了下来。但“刑余之人”，活着比死去需要更大的勇气。在《报任安书》中，他用了一个不大多见很可能是自己生造的词：狂惑——内心的痛苦和矛盾足以让人疯狂。然而痛苦恰恰又是一种更深刻的生命，在痛苦的重压下，他完成了一次悲壮的涅槃，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男性，却多了一个男人。知耻而后勇，他连死都不